

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起到的支撑作用研究——基于 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发展来分析

贾朋毅

(重庆文理学院, 重庆永川 402160)

摘要: 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的纵深推进,为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注入了新动能。重庆作为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及国家中心城市,在区域经济总体布局中占据关键地位,其发展水平与政策导向对西部经济增长具有重要的引领与带动作用。基于财政支出作为政府宏观调控核心工具的视角,其在基础设施建设、产业结构优化及公共服务供给等领域的关键作用,构成了分析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理论依据。针对现有研究对省际间财政支出效率差异关注不足的议题,选取 2008—2022 年中国西部 9 省区的面板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并引入重庆虚拟变量及其交互项,实证检验重庆与其他西部省份在财政支出效率上的异质性。结果显示,人均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其中,重庆的人均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显著高于西部其他省份,为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核心支撑作用提供了微观的效率证据。据此,应持续优化西部地区财政支出结构,提升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强化重庆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功能,以此推动西部地区协调发展。相关结论可为西部地区财政政策优化及提升重庆战略支撑能级提供经验借鉴。

关键词: 重庆; 西部大开发; 财政支出; 区域经济发展; 固定效应模型

一、引言

在新时代背景下,伴随着区域发展战略的不断推进,西部地区在全国区域发展中所处的地位越来越重要,如何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新发展格局,就成为重要的任务。2024 年 4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召开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工作会议,提出要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这就意味着西部大开发已经从单纯的基础设施建设时期迈入到以“大开放促进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了^[1]。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后,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条件得到改善、产业结构调整以及经济总量持续增长,伴随着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深入推进,怎样进一步增强核心城市带动作用、提高西部地区发展质量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重庆是西部唯一的一个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也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重要的综合交通枢纽,在西部大开发中起到支撑作用。近年来,重庆基础设施建设、先进制造业发展、数字经济的发展、对外开放等各方面不断加码投入,对区域产业的升级以及经济发展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从区域发展规划来看,重庆不但自身经济规模不断增大,而且通过区域内产业协同、交通联通、市场融合等方式对周边地区产生了较大的辐射效应,因此,研究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起到的支撑作用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财政支出属于政府的宏观调控手段,它又是改善区域经济发展的政策工具。合理的财政支出结构有利于改善基础设施、提高公共服务、带动产业集聚和技术进步,从而增强地区经济活力。西部地区在发展过程中财政支出对交通建设、产业发展、民生改善等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财政支出的作用效果受资源配置效率、地区发展水平、制度环境等很多因素的影响,必须经过实证分析来考察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

目前的文献大多从宏观上论述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而对于西部大开发重点城

[1] 习近平主持召开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强调进一步形成大保护大开放高质量发展新格局奋力谱写西部大开发新篇章李强蔡奇丁薛祥出席[J].党建,2024,(5):4-5+22.

市支撑作用的实证研究很少,尤其是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为背景,结合重庆作为西部重要增长极的特点来研究财政支出对区域经济的影响,有利于认识重庆在支撑西部大开发中所起的作用。因此本文选取西部地区九个省份为研究对象,主要分析重庆作为区域核心增长极的异质性。在西部大开发的整体环境下,用以识别重庆财政支出的溢出效应以及转化效率的面板数据模型。不仅可以证明财政政策具有普遍有效性,还可以从横向比较中找出重庆支撑西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逻辑,分析财政支出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检验重庆的支撑作用,给完善区域财政政策、提高重庆辐射带动作用提供参考。本文主要思路就是查阅文献提出假设,说明数据来源、变量含义及模型设计,实证检验得出结论,并对研究结果及政策建议做出总结。

二、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一) 西部大开发战略政策效应研究

2000年后,学者们开始对西部大开发的经济增长效应、区域收敛效应、产业结构调整效应等做了比较系统的探讨,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区域经济增长的效应。有学者使用面板数据模型或者双重差分法对西部大开发对地区生产总值增长的影响进行研究,得出结论认为西部大开发通过基础设施建设、财政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政策手段推动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谢贞发(2025)从区域发展战略与财税政策互动的角度出发,对财政政策对于区域协调发展的基础性制度保障作用进行分析,财政资源再配置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一种机制^[2]。

第二,技术进步和技术赶超效应的研究。郑春继(2022)把西部大开发战略当作准自然实验,用PSM-DID检验技术来检验追赶效应,得出战略的实施缩小了西部和东部地区的技术差距,它的效果是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和人力资本积累来实现的,并且政策效果存在城市行政等级差异,这给区域战略和技术差距关系提供经验证据^[3]。

第三,财政政策结构同区域增长的关系。吴俊培(2022)运用门槛效应模型研究了财政支出空间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发现存在规模门槛^[4],陈晓东(2024)采用一般均衡思想,认为公共资本形成及技术溢出会改变经济增长的长短期效应^[5]。战略上,范恒山(2020)认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已经从以前的单纯基础设施扩张阶段转变为了高质量发展阶段,重视制度创新以及开放型经济体系的建设^[6]。这给本文从财政支出结构视角分析重庆支撑作用赋予了战略背景

现有的研究可以很好地解释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宏观经济效应,但是还存在着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分析对象为西部整体,没有对主要的支撑城市功能进行系统的分析,二是缺少财政支出结构对区域战略支撑机制的综合分析。

(二) 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

财政支出结构决定地区经济增长的主要制度因素。不同类型的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不同的,郭庆旺(2003)认为生产性财政支出(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支出)有利于经济增长,非生产性支出会造成效率损失^[7],潘炜(2025)从实证结果出发,指出财政支出结构改

[2] 谢贞发,李培,杨健鹏,等.区域发展战略、财税政策与平衡发展——基于2000年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经验与启示[J].财政研究,2025,(4):30-45.

[3] 郑春继,邓峰.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的技术追赶效应——基于西部大开发战略效应的再审视[J].当代经济研究,2022,(2):109-118.

[4] 吴俊培,陈曾,刘文章.辖区内财政支出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极化效应”还是“扩散效应”——基于中国230个地级市的面板数据门槛效应模型分析[J].宏观经济研究,2022,(10):20-36.

[5] 陈晓东,米浩铭.财政规模、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基于一般均衡框架的理论研究[J].统计研究,2024,41(11):76-89.

[6] 范恒山,肖金成,陈耀,等.西部大开发:新时期新格局[J].区域经济评论,2020,(5):1-15.

[7] 郭庆旺,吕冰洋,张德勇.财政支出结构与经济增长[J].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03,(11):5-12.

善可以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8]。

从财政制度上看,王帅(2025)认为,预算就是国家战略的制度支撑,财政的资源配置方向是国家战略决策的风向标,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就是财政预算在西部地区结构性放大的过程,数字经济背景下财政政策增长效应的新表现为新的特征^[9],曾晶(2025)用 DSGE 模型分析财政支出政策对平台经济发展的影响,财政支出通过技术创新、要素流动等途径实现乘数放大,增加了财政政策作用路径的研究内容^[10]。

除此之外,赵宇飞(2024)认为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进入高质量发展新阶段以后,它作为中国经济的“第四极”,战略地位越来越突出^[11]。重庆是其中的核心增长极,它的财政支出的功能也已经由原来的本地增长,扩展到了区域产业协同、陆海新通道建设等,从而具有了对西部地区发展的引领作用。这就要求在分析财政支出的时候,要把它放到区域联动发展这个大背景下去考察。

根据现有的研究,可以得出财政支出结构经由公共资本累积、人力资本形成、技术创新以及制度环境改善等途径对区域经济增长质量产生影响的理论共识。为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财政支撑功能分析提供理论基础。

(三) 区域发展战略与技术追赶的内在逻辑

技术追赶理论认为后发地区依靠制度创新、要素优化配置、创新环境改善等方式来实现与发达地区的技术追赶,在区域发展战略中,技术追赶一般会通过以下三条途径来完成:第一,人力资本积累机制。区域战略依靠人才政策、教育投入来提高地区的创新能力,其次就是基础设施溢出机制。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的兴建使得交易费用减少,利于知识的交流。第三财政再配置机制。财政再配置利用专项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方式把资本引导到重点领域。第四,产业结构升级机制,政策引导优势产业集聚、结构优化、技术进步。

郑春继(2022)等人认为西部大开发依靠基础设施、人力资本等渠道来实现技术的缩小,但是效果存在区域差异,区域核心城市会在战略实施中起到枢纽、辐射的作用。因此,在新的时代背景之下,有必要把研究的焦点集中在核心支撑城市上,分析财政结构优化以及创新驱动机制对区域协调发展的促进作用。

(四) 中心城市对区域发展的辐射带动机制

王珺(2023)认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主要是以分工协作机制、要素配置机制、知识溢出机制为途径来达到的。中心城市同周边地区存在产业链互补,可以推动区域产业结构优化。这给认识重庆在西部大开发当中起“支撑作用”赋予了理论根基,就是凭借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从而达到对周边省份进行经济赋能的目的^[12]。

(五) 文献述评与研究拓展

综上,现有的研究还存在着如下问题,一是研究层次偏宏观,缺少对西部重要城市支撑功能的全面考察,二是财政支出结构同区域战略之间没有达成统一的分析架构,三是新时代的数字经济以及创新驱动要素并未被包含进去。因此本文的边际贡献就在于,不再只是对重庆一个城市的描述性研究,而是在西部九个省份的比较背景下进行研究。采用 2008 年-2022 年的平衡面板数据,用“基准效应+交互调节”双重识别的方式来量化的分析重庆在财政资源配置效率上所占的优势,从而更严格的证明其在战略格局中起到的支持作用。

[8] 潘炜.财政支出结构优化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分析[J].财富时代,2025,(9):106-107.

[9] 王帅,李明,李珍珍.预算如何体现国家的战略和政策?——以西部大开发为例[J].经济学(季刊),2025,25(6):1561-1578.

[10] 曾晶,余泳泽,夏龙龙.平台经济视角下财政支出政策对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影响——基于 DSGE 模型的协同效应分析[J].财经论丛(浙江财经大学学报),2025,(4):5-17.

[11] 赵宇飞,伍鲲鹏,周思宇.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迈向高质量发展重要增长极[N].经济参考报,2024-05-07(005).

[12] 王珺,杨本建.中心城市辐射带动效应的机制及其实现路径研究[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62(1):161-167.

三、研究设计

（一）计量模型设定

本文用双向固定效应面板模型来研究省级人均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以各省份人均 GDP 对数为被解释变量，人均财政支出对数为核心解释变量，城镇化率、人口规模对数作为控制变量，建立基准回归模型如下所示

$$\ln pgdp_{it} = \beta_0 + \beta_1 \ln pfiscal_{it} + \beta_2 urban_{it} + \beta_3 \ln pop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其中： i 代表省份个体， t 代表观测年份； $\ln pgdp_{it}$ 为各省份人均 GDP 对数，表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ln pfiscal_{it}$ 为人均财政支出对数，是本文核心解释变量； $urban_{it}$ 为城镇化率， $\ln pop_{it}$ 为人口规模对数； μ_i 为省份个体固定效应，控制省份不随时间变化的固有特征； λ_t 为年份固定效应，控制年度宏观政策及时间冲击； ε_{it} 为随机扰动项。

为进一步考察区域异质性，在重庆地区引入虚拟变量和交互项，检验财政支出对经济发展影响在重庆与其他省份间是否存在差异，建立调节扩展模型

$$\ln pgdp_{it} = \alpha_0 + \alpha_1 \ln pfiscal_{it} + \alpha_2 urban_{it} + \alpha_3 \ln pop_{it} + \alpha_4 chongqing_{it} + \alpha_5 \ln pfiscal_{it} \times chongqing_{it} + \mu_i + \lambda_t + \varepsilon_{it}$$

式中， $chongqing_{it}$ 为地区虚拟变量，若样本为重庆市则取值为 1，其余省份取值为 0； $\ln pfiscal_{it} \times chongqing_{it}$ 为人均财政支出与重庆虚拟变量的交互项，用以识别区域异质性效应；其余变量与参数含义同基准模型保持一致。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本文对核心变量做全样本的描述性统计，来了解样本数据整体分布情况、地区差异和结构是否合理，为后面回归分析打下数据基础，结果见表 2。

表 2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ln pgdp$	$\ln pfiscal$	$urban$	$\ln pop$	$chongqing$
count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126.0000
mean	1.2251	0.1193	0.4991	7.7419	0.1190
std	0.5480	0.5575	0.0961	0.7847	0.3251
min	-1.4048	-1.2808	0.2760	6.3172	0.0000
25%	0.9153	-0.2421	0.4296	7.6804	0.0000
50%	1.3084	0.2183	0.5011	7.9754	0.0000
75%	1.6139	0.4639	0.5662	8.2552	0.0000
max	2.1926	1.1998	0.7097	9.0101	1.0000

从统计结果可知，本次实证样本共有 126 个有效的观测值，为 9 省 15 年平衡面板数据，数据分布合理，没有出现极端异常值，变量波动范围也符合西部区域经济发展实际情况，完全符合面板回归分析的要求，变量特征和经济含义如下所示。

1. 被解释变量：区域经济发展水平（‘ $\ln pgdp$ ’）

全样本人均 GDP 对数均值为 1.2251，标准差为 0.5480，最小值为 -1.4048，最大值为 2.1926 之间有合理的差距，分位数结果表明，样本 75% 分位数的经济发展水平为 1.6139，与最大值 2.1926 相差较大，说明西部 9 省份经济发展水平总体较低，内部分化现象较为严重，存在四川、陕西、重庆等相对发达的省份以及甘肃、青海等发展较为落后的地区，完全符合西部地区发展不均衡的实际情况，也为本文识别核心城市的作用提供足够的样本差异基础。重庆样本人均 GDP 对数均值为 1.872，比全样本均值高出很多，在 9 省中一直居于第一梯队，初步体现了重庆西部地区经济领先的地位。

2. 核心解释变量：人均财政支出（‘ $\ln pfiscal$ ’）

全样本人均财政支出对数均值为 0.1193，标准差为 0.5575，是所有核心变量中离散程度

最高的一个指标，最小值为负 1.2808，最大值为正 1.1998，二者相差很大，说明西部各个省份的财政投入强度存在着较大的地区差异。该特点同西部大开发的政策实际非常吻合，一方面，中央给予西部生态脆弱、经济欠发达的省份较大数额的转移支付，使得青海、宁夏等地人均财政支出提高，另一方面，重庆、四川等经济大省的财政自给率较高，财政支出更多地投向生产性领域，给本文分析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以及重庆财政支出差异效应赋予了足够大的样本变异。

3. 控制变量

城镇化率 (urban) 全样本均值为 0.4991，说明样本期内西部省份的平均城镇化率为 50% 左右，按照城镇化发展的 S 型曲线，该阶段正处在城镇化快速推进的黄金期，人口和产业向城镇集聚所形成的规模效应、溢出效应将不断释放出来，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从分位数上看，25% 分位数的城镇化率为 0.4296，最大值为 0.7097，说明西部省份城镇化程度存在较大差异，重庆样本期末城镇化率为 70% 以上，是西部平均水平的两倍以上，具有依靠城镇化协同带动周边区域发展的基础条件。

人口规模对数 (lnpop) 均值为 7.7419，标准差为 0.7847，最小值为 6.3172，对应的是人口小省如青海、宁夏，最大值为 9.0101，对应的是人口大省如四川、重庆，这种西部省份人口体量“大小分化”的现实状况，正好体现了四川、云南等人口大省和青海、宁夏等人口小省并存的地区分布情况，也给模型控制人口基数对人均经济增长的稀释效应提供了合理的数据支持。

4. 重庆虚拟变量 ('chongqing')

全样本均值为 0.1190，对应的重庆 15 年样本占全样本 126 个观测值的 11.9%，和 9 个省份的样本结构完全吻合，保证重庆样本在全样本中具有结构上的合理性，防止因为样本比例不平衡造成回归偏差。

(三)、基准回归结果分析

本文使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做基准回归，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是面板数据分析中处理内生性问题的经典方法，通过控制省份个体固定效应和年份固定效应，一方面可以排除西部省份不随时间变化的资源禀赋、地理区位、行政层级等固有差异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另一方面可以吸收全国宏观经济波动、西部大开发政策调整、疫情冲击等随时间变化的共同冲击，最大程度上缓解遗漏变量造成的内生性偏差，回归结果见表 3。

表 3 基准回归与重庆交互项结果（双向固定效应）

变量	模型 1：整体效应（双向 FE）	模型 2：重庆交互项（双向 FE）
常数项	7.2130 (0.289)	8.3655 (0.234)
lnpfiscal	0.6011* (0.071)	0.5997* (0.071)
urban	3.9848*** (0.001)	3.9781*** (0.001)
lnpop	-0.8346 (0.250)	-0.9618 (0.199)
lnpfiscal×chongqing	-	0.1118*** (0.002)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126	126
调整后 R ²	0.854	0.8536
AIC	-13.54	-12.45

Note: The values in brackets are p-values; *** p < 0.01, ** p < 0.05, * p < 0.1

1. 模型 1：财政支出对西部经济的整体增长效应

模型 1 为全样本基准回归，主要目的是检验财政支出对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为后面分析重庆的支撑作用打下“政策有效性”基础，核心结果的经济含义及理论契合度分析如下表所示。

(1) 核心解释变量：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显著为正，验证核心研究假设

人均财政支出变量 $\ln pfiscal$ 回归系数为 0.6011，在 10% 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显著正向的，严格地证明了本文主要的研究假设，即人均财政支出对于西部区域经济发展的正向影响。

从计量模型的经济含义来看，本文的被解释变量和核心解释变量都是以对数形式出现的，是经典的双对数模型，回归系数具有非常明显的弹性解释意义，在控制省份固有异质性、全国层面的时间冲击、城镇化率、人口规模等之后，西部省份人均财政支出每增加 1%，区域人均 GDP 会提高 0.6011%。这一结果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说明在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中，财政支出一直是中国拉动区域经济增长的主要政策工具，财政投入通过基础设施补短板、公共服务提质、产业扶持引导、创新驱动支持等方式，弥补了西部市场化程度不高造成的市场失灵，激发了区域经济增长内生动力，为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财政政策优化提供最直接的经验证据。

从和已有的文献进行对比之后，本文得到的回归结果与国内学者对于西部大开发财政政策效应的研究结果十分吻合，而且 0.6011 的弹性系数也可以表明，在经济基础较弱、市场机制还不健全的西部地区，政府财政支出引导作用以及乘数效应比东部市场化程度较高地区的要强得多。

(2) 控制变量：结果完全符合经济理论与西部发展现实

城镇化率 $urban$ 回归系数为 3.9848，在 1% 的统计水平下高度显著为正，是所有变量中系数绝对值最大的一个指标，说明城镇化是西部经济增长的主要内生动力。从经济含义上来说，西部省份城镇化率每提高 1 个百分点时，区域人均 GDP 的对数值会增加 3.9848 个单位，这种明显的正向作用来自城镇化过程所带来的一系列增长红利：人口向城镇集中造成了劳动力池效应，从而使得企业的人工成本与用工成本得以减轻，并且中间投入品的共享效应以及知识溢出效应也由此显现出来；产业向园区和城镇聚集成了一种中间投入品共享效应和知识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城镇化建设导致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市场、消费品市场同时扩张形成了一种“投资 - 消费 - 增长”良性的互动关系。结果也符合西部城镇化发展阶段特征，西部平均城镇化率不到 50%，仍处在快速增长期，城镇化的边际增长效应远大于东部城镇化率饱和区，是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内生动力。

第二，人口规模 $\ln pop$ 的回归系数为 -0.8346， p 值为 0.250，未通过 10% 水平的显著性检验，系数符号为负但是不显著，与西部人口发展现实一致。就理论逻辑而言，人口规模对经济增长有规模效应和稀释效应两个方面的影响，即人口增长如果以高素质产业人口流入为主，则会产生规模效应，促进经济增长；而人口增长如果以低技能人口的自然增长为主，并伴随着青壮年劳动力净流出，则会带来公共服务、资源环境的稀释效应，从而对人均经济增长产生负向影响。

西部省份的实际情况属于第二种情形，在样本期内，西部大多数省份人口一直保持净流出状态，青壮年劳动力、高素质人才不断向东部沿海地区迁移，常住人口增长主要依靠自然增长，人口的人力资本质量普遍较低；与此同时，西部的产业结构是以资源型产业、传统农业为主，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比较缓慢，吸纳就业的能力较弱，人口规模的增长不能带来有效的人口产业集聚与规模效应，反而加大了教育、医疗、社会保障等公共服务供给的压力，因此人口规模对于人均经济增长的影响是不显著的负向关系。该结果不是由于模型设定有误造成的，而是对西部人口和经济发展现实的一种反映。

(3) 模型拟合效果：整体设定合理，解释力充足

模型调整之后 R^2 达到 0.8540，表示本文所设定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可以解释西部省份

经济增长差异的 85.4%，AIC 值为-13.54，数值较低，说明模型信息损失小，整体设定科学合理，回归结果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可信度。

2.模型 2：重庆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支撑效应

模型 2 在基准模型基础上，加入重庆虚拟变量和人均财政支出的交互项（ $\ln pfiscal \times chongqing$ ），主要目的就是检验重庆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效应是否比其他西部省份要好，从而识别出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起到的核心支撑作用，这是本文实证分析的重点，回归结果的详细分析如下表所示。

（1）核心交互项高度显著，严格验证重庆的效率支撑作用

交互项 $\ln pfiscal \times chongqing$ 的回归系数为 0.1118，在 1% 的统计水平上高度显著为正。从计量学的角度来说，这表明重庆对于财政支出和经济增长之间因果联系的正向影响效应是明显的，重庆的财政支出对于经济增长的推动效应要好于西部其他地区，这也是本文找到重庆支撑作用的关键实证证据。

从具体的经济效应测算可知，西部其它省份的财政支出经济增长弹性为 0.5997，而重庆的财政支出总增长弹性=基础系数 0.5997+交互项系数 0.1118=0.7115。由此可以看出，在同样的控制条件之下，人均财政支出提高 1 个百分点，重庆人均 GDP 就会增长 0.7115 个单位，比西部其它省份的增长幅度高 18.6%。这就说明重庆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经济转化效率比西部其它省区都要高，是西部地区财政投入的“效率标杆”，给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赋予了关键的效率支撑。

根据重庆的发展现实，其财政支出效率居首的原因可以总结为四个方面，即四维驱动。

第一，财政支出结构改善，生产性支出所占比例增大。重庆是西部的先进制造业中心、数字经济高地，财政支出重点投向集成电路、智能网联汽车、工业互联网等战略性新兴产业，西部陆海新通道、成渝双城经济圈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等生产性领域，该类支出的长期增长效应和乘数效应更明显；而西部其它省份的财政支出更多用于生态保护、民生兜底、脱贫攻坚等，该类支出的社会效益明显，但是短期内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较弱。

第二就是行政层级的优势，财政资金管理效率提高。重庆属于西部唯一一个直辖市，实行市区县两级行政管理体制，行政链条较短，财政资金下达、使用、监管效率更高，并且建立起了较为严格的财政资金绩效评价体系，极大地降低了财政资金使用中的漏损和低效配置，使财政资金真正投入到经济增长的动力之中。

其三，产业集聚效应更强，财政投入的乘数效应被放大。重庆是国家中心城市，拥有汽车产业和电子信息产业两个万亿级产业集群，产业链配套较为完善，财政对于龙头企业、核心技术、产业园区的投资可以迅速带动数倍的社会资本跟进，从而产生财政引导、社会资本跟进、产业集聚、经济增长的良性循环，财政支出的乘数效应被大大放大。

第四、区位优势以及开放程度更为显著，财政支出产生的辐射面也更广。重庆是长江上游经济中心、西部陆海新通道运营中心，财政投资建设的港口、铁路、物流枢纽等基础设施，对本地经济发展起着促进作用，对整个西部地区的物流成本降低、贸易便利化提高起到促进作用，进而使本地经济增长受到带动，从而进一步放大财政支出增长效应。

（2）基准变量结果保持高度稳定，验证交互项结果的独立性与可靠性

加入重庆交互项之后，核心解释变量 $\ln pfiscal$ 的系数是 0.5997，和模型 1 中的 0.6011 基本一致，仍然显著性在 10% 水平上；控制变量 $urban$ 的系数是 3.9781，和模型 1 中的 3.9848 基本没有差别，仍然显著性在 1% 水平上；人口规模 $\ln pop$ 的系数符号和显著性也没有实质性变化。

这一结果表明，重庆交互项的加入不会对基准变量的回归结果造成影响，本文基准回归结果具有很强的稳定性，重庆交互项的显著正向结果是独立、可靠的，并不是由于模型设定偏差或者变量之间多重共线性所导致的，从而加强了结论的可信度。

（3）模型拟合效果保持稳定，结果可信度高

加入交互项之后，模型调整后的 R^2 仍然保持在 0.8536 的高位上，与模型 1 的 0.8540 几乎没有什么差别，说明加入重庆交互项之后，模型依旧拥有很强的经济增长解释力；AIC 值也只出现了小幅的正常波动，整体模型的设定依然较为合理，回归结果也比较可信。

（四）、稳健性检验

为了保证本文实证结果的有效性，防止因为极端异常值、模型设定错误、遗漏变量等原因造成回归误差，本文用两种主流稳健性检验的方法对核心结论进行了检验，结果见表 4。

变量	稳健性 1：1% 缩尾处理	稳健性 2：仅控制个体固定效应
常数项	4.8698 (0.212)	8.8395 (0.121)
lnpfiscal	0.4048** (0.030)	0.3256*** (0.006)
urban	3.9357*** (0.000)	4.4673*** (0.000)
lnpop	-0.6003 (0.142)	-1.0722 (0.116)
lnpfiscal×chongqing	0.0952*** (0.001)	0.1138*** (0.000)
省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不控制
观测值	126	126
调整后 R^2	0.9547	0.8584

Note: The values in parentheses are p values; *** means $p < 0.01$, ** means $p < 0.05$, * means $p < 0.1$.

1.稳健性检验 1：极端值 1% 缩尾处理

面板数据分析的时候，由于自然灾害、疫情、局部政策调整等特殊冲击会使得个别年份的经济、财政数据出现异常波动，这些极端异常值会对回归结果造成干扰，从而引起结论的偏差。为了避免该问题，本文对 lnpdp、lnpfiscal、urban、lnpop 等所有连续变量都做上下 1%的缩尾处理，去掉极端值之后再进行双向固定效应回归。

结果显示核心交互项 lnpfiscal×chongqing 的系数是 0.0952，在 1%的统计水平下仍然是显著为正的，但是系数大小比基准回归略有降低，核心解释变量 lnpfiscal 的系数是 0.4048，显著性提高到 5%，控制变量 urban 仍然在 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所有的变量符号都和基准回归一致。

这一结果表明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不会受样本中出现的异常值影响，即使剔除掉一些特别波动的观测值，重庆财政支出效率的领先效应仍然很突出，基准回归的结果具有很高的稳定性。

2.稳健性检验 2：变更模型设定（仅控制个体固定效应）

本文基准回归中所使用的双向固定效应模型是面板分析最严格的模型之一，可以控制个体和时间的固定效应，最大程度上减少了内生性的问题。为了检验模型设定是否合理，本文对控制条件进行了放松，只控制了省份个体固定效应，不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再次做回归检验核心结论是否会因为模型控制条件的不同而改变。

从结果可以看出核心交互项 lnpfiscal×chongqing 的系数为 0.1138，与基准回归中 0.1118 几乎一致，并且显著性提高到了 1%($p=0.000$)，核心解释变量 lnpfiscal 的系数为 0.3256，在 1%水平上显著，控制变量 urban 依然在 1%水平上显著，所有的核心变量符号与基准回归没有实质性的改变。

结果表明，不管是否加入年份固定效应，重庆财政支出的领先增长效应一直存在，本文的核心结论不会因为模型设定的改变而改变，基准回归结果具有很高的可靠性，不是由于某种模型设定或者某个年份的政策冲击所造成的。

另外两种稳健性检验的结果调整后的 R^2 均大于 0.85，缩尾后的调整后的 R^2 更高达 0.9547，这说明本文的模型设定科学合理，结论也具有很强的稳健性、可信度。

四、实证研究核心结论

本文以 2008-2022 年西部九省平衡面板数据为基础，用双向固定效应模型、交互项分析以及多重稳健性检验来系统研究财政支出对西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并着重考察了重庆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中起到的支撑作用，最后得到如下四个主要结论，完全符合本文的研究主题和理论框架。

结论一，财政支出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政策手段，具有较强的经济增长推动作用

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基准回归表明，人均财政支出对于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在控制其他各种干扰因素之后，人均财政支出每提高 1%，西部省份的人均 GDP 就增加 0.60%，并且该结果在多重稳健性检验中是可靠的。

该结论不但证明了本文的主要研究假设，而且也说明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 20 多年以来，财政政策一直起着主要的支撑作用。在西部地区市场化程度整体上低于东部、市场机制还不完善的情况下，政府财政支出很好地弥补了市场失灵，以基础设施建设补齐了西部发展的硬件短板，用教育、科技投入提高了区域的人力资本水平和创新能力，用产业扶持引导推动了西部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从而有效地激活了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在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进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中，财政支出依然是促进西部区域协调发展、缩小东西部差距最重要的、最有效的政策手段。

结论二，重庆属于西部核心增长极，财政支出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具有很强的效率保障能力

重庆虚拟变量和人均财政支出的交互项在 1% 水平下显著为正，根据计算结果可知，重庆财政支出的经济增长弹性为 0.71%，比西部其他省份高出了 18.6%，经过多次稳健性检验后得到的结果。

该结论表明，重庆是西部唯一的直辖市、国家中心城市，它的财政资金配置效率、经济转化效率远高于西部其它省份，相同的财政投入可以带动更高的经济增长，给新时代西部大开发赋予了核心的效率支撑。从增长极理论来说，这说明重庆作为西部区域的中心增长极，自身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同时，也通过财政支出结构调整、绩效管理改革、产业引导模式创新等方式形成可以复制、可以推广的财政政策经验，是西部地区财政改革和高质量发展的“标杆”和“试验田”，也是重庆西部大开发支撑作用的核心体现。

结论三，重庆的支撑作用有很强的内生动力，新型城镇化是其发挥辐射带动效应的主要空间载体

本文所有的回归模型中，城镇化率都具有高度显著的正向影响，是西部经济增长的最强大内生动力，重庆样本期末城镇化率已经达到了 70% 以上，远远高于西部平均水平 50%，具备了通过城镇化协同带动周边地区发展的核心优势。

这一定论表明重庆推进支撑作用的核心途径就是新型城镇化是重庆辐射带动西部地区的主要空间承载者。一方面重庆依靠自身新型城镇化发展，持续吸纳西部人口和产业聚集，产生巨大的规模效应与创新能力，从而加强自身增长极功能，另一方面重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契机，同四川展开城镇化协同推进局面，借助轨道交通互联互通、产业园区共建、公共服务共享等方式，把自身城镇化红利辐射到周边区域，带动川东、黔北、陕南等地的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构建起“核心城市-都市圈-城市群-西部腹地”的辐射传导渠道，使得重庆的支撑作用从“自身效率领先”变为“区域协同发展”，完全契合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以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要求。

结论四：本文实证结论具有很强的稳健性、现实针对性，给新时代西部大开发的财政政策优化提供可靠的经验证据

经过极端值缩尾处理、变更模型设定两种主流稳健性检验后，本文关于财政支出增长效

应、重庆效率支撑效应的核心结论始终保持着高度显著，没有出现任何实质性变化，说明本文实证结论不是偶然的回归误差，而是基于西部发展现实得出的可靠的经验证据。

同时本文选取的2008到2022年这十多年间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不断深入推进的大周期，本文的研究结论具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和实践价值。本文不仅证明了财政支出对于西部大开发的成效，而且准确找到了重庆在其中的核心支撑作用以及实现途径，为重庆进一步发挥西部增长极的功能、增强辐射带动能力提供有力的实证支持，也为国家改善西部大开发财政政策、完善中心城市引领区域协调发展的制度体系提供有根据的依据。

五、政策建议

根据本文对于西部9个省份以及重庆的实证研究结果，就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优化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首先要创建以“效能导向”为准则的差别化的财政激励制度。实证结果表明，人均财政支出对于西部地区经济有明显的正向带动作用，但是各个省份之间的转化效率不一样。所以宏观层面的财税政策应该由原来的“基数导向”转变为“效能导向”。中央财政在给西部地区转移支付、拨付专项资金的时候，应该把财政支出绩效评价体系纳入其中，参照重庆在生产性支出配置、行政管理方面取得的成功经验，促使西部省份改进支出结构，削减无效或低效的非生产性支出，从而最大程度地发挥出财政资金对于区域经济的边际效应。

第二，应该用加强中心城市制度溢出的方式实现区域内政策协同。交互项高度显著说明重庆是增长极，在财政资源调配效率上具有明显的优势，而这种优势不能只存在于本地，它应该成为推动整个西部地区发展的一种“制度红利”。在未来的战略布局上，应当继续冲破行政壁垒，依靠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这些重大战略平台来探寻跨区域财政投入共担和利益共享的途径。通过产业园区共建、公共服务标准统一等方式的协同，在重庆带动周边区域的发展，把重庆效率转化为区域整体发展动力。

另外必须坚定不移地把新型城镇化作为释放西部内生增长动力的空间载体。本文实证结果表明，城镇化率对经济增长的系数贡献最大，是西部发展的主要驱动力。因此财政政策要向人本城镇化倾斜，用财政资金来保证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基本公共服务需求，提高城镇对产业和人口的承载能力。依托重庆城镇化水平高、率先发展的先发优势，打造以重庆都市圈为梯度中心的梯度城镇化结构，依靠交通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公共资源的合理配置来推动西部腹地实现规模经济和技术溢出，在空间格局上筑牢西部大开发的支撑体系。

（三）研究不足与未来展望

文章就财政支出与区域经济发展做了实证分析，但是存在的问题是文章只用宏观面板数据，没有考虑到财政支出结构差异不同产业部门。二是由于数据缺乏可得性，文中没有考虑更多的制度性或者创新性的变量。后期可以用空间计量模型或者中介效应模型来检验财政支出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影响区域经济发展的关系。